

大象

学术

译丛

[英] 约翰·达尔文 (John Darwin) 著

陆伟芳 高芳英 译

后帖木儿时代

——全球帝国的兴与衰 (1400—2000)

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

 大象出版社

后帖木儿时代

——全球帝国的兴与衰（1400—2000）

After Tamerlane

The Rise and Fall of Global Empires, 1400–2000

[英] 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 著

陆伟芳 高芳英 译

 大象出版社

前 言

1405 年帖木儿(Tamerlane)之死是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帖木儿是阿提拉(Attila)和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式的一系列“世界征服者”中的最后一位,他艰苦卓绝地把整个欧亚大陆——“世界岛”——置于一个大帝国的统治下。在他死后半个世纪内,以葡萄牙为先锋的欧亚大陆西端的海洋国家,开始探索通向海洋帝国必经之路的海上新航路。这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

在我们仔细考察前,这似乎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帝国之路的开辟(指海上新航路的开辟——译者注)和经济上的杰出成就,使西方崛起为全球的主宰,这是最基本的历史知识之一。它有助于形成我们的历史观。在许多标准的评论里,这似乎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康庄大道,而其他的选择都是羊肠小道或死胡同。当欧洲的帝国解体,为新的后殖民国家所取代,那么欧洲自己又成为“西方”的一部分——美国领导下的世界范围的同盟。本书的目标在于展示从帖木儿时代到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比传奇故事中竞争更为激烈、混乱和贻误时机的时代——尽管这是一个很难表述清楚的观点。但我们在这么做的时候,把欧洲放到了更为广阔的背景中,即欧亚大陆其他部分的帝国、国家和文化建构工程里。只有这样,才能适当地把握欧洲扩张的进程、性质、规模和限度,使我们当代世界的一团乱麻的渊源变得清晰一些。

如果没有过去 20 年里的大量新著作,本书的写作是不可能的。这些著作既有“全球”史,也有中东史、印度史、东南亚史、中国史和日本史。当然,并不是最近历史学家们才坚持全球史观:这个传统可追溯到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大多数历史著述中隐藏着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之事的一系列猜想。然而,系统地考察世界不同地方之间的联结则是相对新近的事。弗雷德里

克·泰格尔(Frederick Tegg)在他的《罗马与中国》(*Rome and China*, Berkeley, 1939)中说道,“只有充分认识到所有人民都有其历史,认识到这些历史是在同一个世界同时发生的,认识到比较它们是知识的起点”,“对过去的研究才是卓有成效的”。^[1] 麦克尼尔(W. H. McNeill)在《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 Chicago, 1964)中以顽强的精神迎接了这种挑战,其书名精明地隐含着他对研究范围的理解。不过,近年来,全球的和非西方史的资料大幅增长,其重要原因来自“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但是,大迁移和移民(创造了一个流动的、“反民族”历史传统)的影响,曾经把“历史”当做国家私有财产的许多王朝的解放(中国就是个绝好的例子)也许同样重要。读者渴望读到以新的、更为自由的观点重新解读历史的著作,推动了历史著述的大量出版。这一切似乎对只能用一条途径——欧洲扩张的故事——进入历史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远景。考察欧洲进入现代世界的轨道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的社会文化变迁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何理解欧洲得以主宰世界,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人更容易、更有资格。

我对其他历史学家的著作的感激之情在每章末尾的注释(已改为脚注——译者注)中一目了然。在我作为具有无限的历史想象力的已故杰克·加拉格尔(Jack Gallagher)的学生时,他的引人入胜的著作,第一次把世界作为联结的整体进行介绍。我从牛津的同事——朱迪思·布朗(Judith Brown)、戴维·沃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格奥尔格·多伊奇(Georg Deutsch)和彼得·卡雷(Peter Carey)那里,学到了大量的帝国史和全球史知识,我也得益于校园内外的许多其他同事的专业知识,铭记着他们充满智慧的言辞。关于经济问题的理解则通过与全球经济史网络(Global Economic History Network)的联系而不断完善,该网络由帕特里克·奥布莱恩(Patrick O'Brien)创立,成为讨论世界不同部分经济变迁多样化途径的平台。本书中的有些思想受到与詹姆斯·别利奇(James Belich)和菲立浦·巴克纳(Phillip Buckner)的“旅行研

[1] Frederick Tegg, *Rome and China* (Berkeley, 1939), p. 245.

讨论”讨论的激励。教授这么多天才学生的刺激是必不可少的,我的历史学教育通过在过去 20 多年里对博士生的指导而得到极大的扩展。我特别感谢那些评论本书初稿的朋友和同事:理查德·邦尼(Richard Bonney)、伊恩·菲米斯特(Ian Phimister)、罗伯特·霍兰(Robert Holland)、马丁·恰德尔(Martin Ceadel)和安德鲁·赫里尔(Andrew Hurrell)。本书的错误和疏忽遗漏由我负责。

我用科林斯·巴塞罗缪(Collins Bartholomew)出版的“地理信息系统”项目作为我书中地图的基础。没有博德莱安(Bodleian)地图系的奈杰尔·詹姆斯(Nigel James)的指导、劝告和不厌其烦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愉快地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

没有企鹅出版社的西蒙·温德尔(Simon Winder)的关注和鼓励,本书的写作任务会难得多。面对西蒙的热心,没有作者会让他的努力付诸东流:我对他的关怀以及他在某些关键时刻的精明与适时的劝告极为感谢。

最后,我之所以能在许多杂务中长期坚持写作,主要是因为牛津大学图书馆异常丰富的资料,以及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给研究人员随时随地提供的无可比拟的研究和写作设施。

人名与地名注释

写一本覆盖面广、时间跨度大的书,必然涉及某些相关人名、地名在语言上的尴尬。不仅名字改变,而且这种改变往往反映了看法、地位以及统治的变化。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改变城市、城镇和街道——甚至国家的名字——作为象征旧秩序(通常是殖民地的)的结束和一种本土文化身份的确认。 xiii

我的做法是使用最可能为西方和英语读者熟悉的名字,同时适当注意其他的版本。有时,这意味着使用对特定地方有着特殊的当代意义的名称。由此,我使用“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而非“伊斯坦布尔”(Istanbul)来表示奥斯曼(Ottoman)帝国的首都。这是该市在 1453 年被土耳其征服后西方长期的标准用法。我保留它表明其作为帝国首都的角色(与现代伊斯坦布尔相

当不同),也表明其作为一个有朝一日“被解放”的被占基督教城市的地位(在许多欧洲人的眼中)。这种信念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洛桑条约》(Treaty of Lausanne)为止。

有三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古罗马化的伊斯兰名字总是有点主观臆断——也许这样是不可避免的。当欧洲人试图翻译伊斯兰名字的读音时,好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写出了拼写上的无穷无尽的多样性,在今天看来有些似乎是奇异的。使事情更复杂的是,有些变化反映了在欧亚中部三个主要伊斯兰语言——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口语间的差异。最为熟识的伊斯兰名字如Mahomet、Mehmet、Mohamed和Muhammad。Feisal会拼成Faisal或Faysal。我希望我使用了熟悉的容易理解的拼法,而不是那些学术上更“准确”的拼法。

第二,关于伊朗的例子。直到1935年,伊朗被正式称为波斯,这在西方是普遍为人所知的国名。然而,“伊朗”在该地区和区域更为常用,为了简化,在本书覆盖范围内,我选择了使用它作为这个地域单元及其人民的标准术语。但重要的应该记住,“波斯”(一个从波斯语Farsi来的词)是占支配地位的语言和文化,也是描述同一片土地上种族划分中占支配地位的最大的同种同文化的民族。

第三,关于中国。现在广泛使用的拼音体系是用罗马字母书写的中文。然而,既然本书的关于中国人名和地名的大多数参考书,我依照旧WadeGiles体系,保留了最可能为西方读者熟悉的形式。最显明的例子如下:

清朝是Ch'ing而不用Qing;

北京是Peking而不用Beijing;

南京是Nanking而不用Nanjing;

广州是Canton而不用Guangzhou;

江南是Kiangnan而不用Jiangnan;

新疆是Sinkiang而不用Xinjiang;

乾隆是Ch'ien-lung而不用Qianlong;

国民党是Kuomintang而不用Guomindang;

蒋介石是Chiang Kai-shek而不用Jiang Jieshi;

毛泽东是 Mao Tse-tung 而不用 Mao Zedong;
周恩来是 Chou En-lai 而不用 Zhou Enlai。

目 录

前言

1

1. 定位

1

2. 欧亚大陆与大发现时代

38

3. 现代早期均势

84

4. 欧亚大陆革命

134

5. 与时间赛跑

186

6. 帝国的界限

250

7. 世界危机之路 (1914—1942)

308

8. 被否定的帝国

358

9. 帖木儿的阴影

411

阅读材料

425

译后记

437

1. 定位

帖木儿之后

1401年,伟大的伊斯兰历史学家伊本·哈尔敦(Ibn Khaldun, 1332—1406)居住在大马士革(Damascus),当时它处于强大的帖木儿之围攻中。由于急于想见到当时最负盛名的这个征服者,伊本·哈尔敦乘坐在一个篮子里,被从城墙上缒出城,在营帐里受到帖木儿的接见。在那儿,他与这个统治者进行一系列的谈话,他把帖木儿描述为(在他的自传里)“是最威严的伟大国王之一……致力于争辩他所知道的与不知道的东西”^[1]。伊本·哈尔敦可能从帖木儿身上看到了岌岌可危的阿拉伯—穆斯林文明的救星。不过,4年后,帖木儿在计划中的征服中国的路途中去世。

帖木儿(有时写做 Timur 或 Timurlenk,“跛子帖木儿”——从此成了他的欧洲名字)是一个成为传奇的非凡人物。大约14世纪30年代,他出生于突厥—蒙古(Turkic-Mongol)部落联盟察合台(Chagatai)汗国的小氏族家庭,察合台是11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蒙古帝国分裂后的四大汗国之一。到1370年,他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主人。在1380—1390年间,他着手征服伊朗、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1390年,他入侵俄罗斯,几年后他再度进犯,摧毁了现代俄罗斯南部的蒙古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首都。1398年,他率大军劫掠北印度,降服穆斯林统治者,摧毁德里(Delhi)。然后,在1400年,他折返中东去占领阿勒颇(Aleppo)和大马士革(伊本·哈尔敦逃

[1] 关于伊本·哈尔敦,参见 Y. Lacoste, *Ibn Khaldun* (Paris, 1969); *Encyclopaedia of Islam* (Leiden, 1999)。

脱了大屠杀),在1402年的安卡拉战役中打败和抓获了奥斯曼苏丹巴亚泽特(Bayazet)。此后,他才转向东方,进行其最后的侵略战役。

尽管有一个嗜血暴君以及掠夺性征服的无可置疑的野蛮人的名声,但是,在欧亚大陆历史上,帖木儿是一个过渡性人物。^[1] 他的征服,是成吉思汗及儿子们打造大蒙古帝国征服的一种回声,该帝国从现代伊朗伸展到中国,北至莫斯科。它鼓励了在欧亚大陆中部沿着巨大的杂草丛生的大草原走廊的人员、贸易和思想的非凡流动,蒙古统治也许充当了一个经济普遍扩张时代的商业和知识变迁的催化剂。^[2] 蒙古人甚至允许西欧特使的访问,盼望着建立一个反穆斯林联盟,赢得基督教徒皈依。但是,到14世纪初,维持一个大帝国联盟的努力几乎失败了。伊朗、金帐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可汗”(Ilkhanate)统治者之间的毁灭性战争,及中国元朝的灭亡(到1368年),标志着统治欧亚大陆帝国的蒙古人试验的终结。

帖木儿的征服部分是努力恢复这个失去的帝国。但他的方法不同。他的大多数战争似乎主要旨在摧毁任何对手,控制巨大的欧亚大陆商路,他的帝国建立在这个利润基础上。而且,他的权力围绕掌握“熟地”多于控制大草原:他的军队不仅由骑马的弓兵(典型的蒙古惯例)组成,而且有步兵、炮兵、重骑兵甚至大象兵团。他的统治制度是一种专制主义,其部落追随者的忠诚与城乡臣民的忠诚相抗衡。帖木儿也宣称是“上帝的影子”(他的许多称号之一),对伊斯兰信仰的背叛者和不信奉者进行复仇。进入他挑选的帝国首都、靠近其出生地的撒马尔罕(Samarkand),他倾倒入征服战利品,来装饰宣扬其帝国辉煌的纪念建筑物。“帖木儿模式”对横跨整个欧亚大陆中部的帝国思想有持久的影响。

尽管他的凶猛、他的军事天才和精明使部落政治适应其帝国目标,但是,

[1] 权威性的研究见 B. F. Manz, *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 (Cambridge, 1989)。

[2] 关于强调横穿蒙古欧亚大陆的交流的最近研究,参见 Thomas T. Allsen, *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 (Cambridge, 2001); 也可参见 John Masson Smith, 'The Mongols and the Silk Road', *Silk Road Foundation Newsletter* vol. 1, no. 1。参见网址: <http://www.silkroadfoundation.org/newsletter/volumeone/numberone/mongols.html>。

帖木儿的体制在他死后瓦解。犹如他自己可能直觉地把握的,不再可能从大草原来统治熟地,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旧根基上建立一个欧亚大陆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埃及(Egypt)和叙利亚(Syria)的马穆鲁克(Mamluk)国家、北印度的穆斯林苏丹,以及最重要的中国,太富于弹性不能被他的雷霆之军所扫除。确实,帖木儿之死在几个方面标志着全球史中的一个长期阶段的终结。第一,他的帝国是挑战欧亚大陆在远西(Far West)、欧亚中部和儒教(Confucian)东亚国家之间分割的最后一次真正尝试。第二,他的政治实验及其最终失败,揭示权力开始从游牧帝国向定居国家的决定性转变。第三,帖木儿对欧亚大陆中部的附带破坏,以及部落社会继续对那儿施加不相称的影响,有助于(但愿逐渐地)旧大陆(Old World)牺牲中心地区向远西和远东(Far East)的倾斜。最后,他的死亡与他争取控制的的东西方通道、现存的远距离贸易模式转变的第一个迹象相吻合。在他去世后几十年内,从撒马尔罕统治一个世界帝国成为荒诞的想法。为全球提供从海洋进入世界各地的海上大发现改变了帝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学。新的世界秩序变得清晰可见需要三个世纪的时间。但帖木儿之后,没有新的世界征服者崛起来主宰欧亚大陆,帖木儿的欧亚大陆不再包含几乎所有已知世界。

全 球 史

在本书中,我们在辽阔的历史场景中探究三个议题:第一是全球“联结”增长到了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强化形式。第二是通过欧洲权力(后来是“西方”)和通过帝国途径在这个进程中起的作用。第三是面临欧洲扩张时欧亚大陆许多其他国家和文化的弹性。每一个因素在塑造世界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半统一的经济政治体系,一个没有哪个国家、社会、经济或文化能保持完全的超然离群的共同活动场所。

不管主题怎么详尽或论题怎么模糊,人们书写历史来帮助解释我们现在的状况。当然,历史学家常常各说各理,一个原因是历史的终端产品——“现在”本质的不同看法。使事情更难的是,我们持续不断地改变我们对现在

的看法,随着事情的展开“更新”我们的看法——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修正我们询问过去的问题。不过,目前人们至少广泛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在许多重要方面与一代人以前相比——1980年前的世界完全不同的时代。直白地说,我们用总揽一切的术语总结最有影响的特点:“全球化”。全球化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它听起来像一种进程,但是我们常常用它来描述一种状态——经过一段变化后的终点站。所有的迹象表明,至少在经济关系方面,世界(在不同区域和大陆的财富和生产活动的分布)的变化速度很可能加快。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能用可辨别的形式描述“全球化世界”(现在全球化已经达到的阶段)的一般特征。无法意料的“现在”制造历史就是本书试图解释的东西。

现将这些特征简要总结如下:

1. 单一全球市场的出现——不是为全部产品而是为最广泛使用的产品,也为提供资本、信贷和金融服务;

2. 在地理上可能非常遥远但其利益(甚至非常小的国家的情况)变得全球化而非区域化的国家间的日益增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3. 通过具有全球性组织的媒体深入渗透到大多数文化,他们的商业和文化信息(尤其是通过“品牌”语言)几乎密不可分;

4. 移民和大移居(被迫的或自由的)的巨大规模,创造着关系网与联结,它们挑战了19世纪的欧洲海外移民或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影响;

5. 从“两极时代”(1945—1989)废墟中涌现出来的单一“超级大国”,与所有其他国家关系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在世界现代史上无出其右者;

6. 中国和印度戏剧性地重现为制造业大国。巨大增长的世界产出和世界经济均势的转移,它们庞大人口(分别为13亿和10亿)的

经济动员被比做 19 世纪巨大新土地的开辟。

这份单子会引出一串问题。在一个全球化了的世界里,一个国家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卓尔不凡的权力?中印的经济复兴为什么是如此新近的事?为什么直到最近,西方国家(现在包括日本)在技术技艺和生活水平方面享有长期的领导地位?为什么西方化文化的产品(科学、医疗、文学、艺术)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享有崇高声誉?为什么国际上的国家体制及其法律和规范反映了欧洲政治统治的概念和实践?为什么领土形式是欧洲模式?20 世纪晚期的全球化世界并不是全球自由市场的可预料结果,我们也不能从 5 个世纪前的世界状态推导出来。它是长期的、混乱的、接连不断暴力史的产品,是财富的突然逆转和意外失败的产品。其根源追溯到(广为相信的)“大发现时代”——确实,追溯到帖木儿之死。

当然,有着数不清的理论和历史,无数次地解释和争论世界历史的进程。全球化的历史(和史前史)总是一直充满争议。既然全球化的大多数特征似乎与欧洲(后来是西方)主导的增长密切相关,它几乎不可能是别的。战斗阵线早就划定了。想象全球化世界的第一批人当中,包括 19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者,他们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身上得到灵感。他们辩论道,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会使战争变得不可能。如果每个国家都依赖外国的供应商和顾客,那么相互依赖网将会太过强大以至于不能被打破。在冲突环境中兴旺发达的战士贵族变得过时。资产阶级的代议制政府思想通过商人和商业传播,会变成全世界的。这种开明的利己主义如何使世界所有人得益的乐观评论,受到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针砭。马克思坚持,或迟或早(他指望它是早些),工业资本主义会用商品淹没其市场。通过降低成本、把工资降到生存成本以下,它会挣扎一段时间。但是,当工人反叛——他们必须反叛——资本主义会内部崩溃,无产阶级起而统治。在斗争中,欧洲外的世界赶上来。在他们对市场的渴望中,欧洲资本家注定要入侵亚洲(马克思的例子是印度),摧毁其前现代经济。印度织工为了兰开夏的利润只能破产,印度的村庄体系和社会秩序“并非主要通过英国收税人的……战士的残

酷干预而消失,而是(通过)英国蒸汽机和英国的自由贸易而消失”。^[1] 这种摧毁工作的可取之处是其并非计划中的后果。它会给亚洲带来社会革命,没有这个(马克思这么隐寓着)世界其他地方不会达到其社会主义命运。

马克思认为,一个全球经济会从欧洲的需求中成长起来。列宁(Lenin)认为,资本主义依赖于经济帝国主义,并预料其在全球殖民地人民的反抗中垮台。^[2] 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半是历史半是预言,似乎是世界历史的钥匙。从20世纪20年代起,它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影响。它把欧洲经济扩张看做统治余下的世界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但是,它没有创立起一个英国自由贸易者承诺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反而分化了世界。以欧洲(及其美洲后裔)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地带越来越富裕,但是地球的余下地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依附地带越来越贫困。资本家的财富和欧洲帝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强制不平等贸易。在非西方世界已经使用了“自由”贸易来摧毁老手工业,阻挡了工业增长,锁定当地经济来生产廉价原材料。确实,因为那些原材料比他们要支付的(争论这么继续说)工业商品便宜得多,贫穷和依赖只会变得更糟,除非直到它们因之而生的“世界体系”被暴力摧毁。^[3]

对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这种全球化(尽管没有使用这个术语)的动机和意义的悲观主义观点,有时与对革命结果的惊人信仰相结合,不只是与乐观主义者宣称的相配,乐观主义者把完全全球化经济的结果视为“现代化”(也就是说,西方社会结构的复制)。两种态度一致假设欧洲(或西方)是历史变迁的唯一真正源泉。双方都使用了德国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惊人洞察力(甚至更惊人的勤勉)。韦伯为欧洲走过的与印度、中国相比特殊的道路所着迷。马克思强调用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取代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革命,而韦伯则探索使欧洲“与众不同”的制度和信仰模式。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发展起来,但只有欧洲实

[1] Karl Marx,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1853), 重印于 E. Kamenka (ed.), *The Portable Karl Marx* (Harmondsworth, 1983), pp. 334 - 335.

[2] 列宁的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出版于1916年的Zurich。

[3] 关于这种思想流派的杰出概述,参见 I.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1983)。

现了向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主导。韦伯解释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个实干家的理性化的心态。中国儒教(理性的但不活跃的)、伊斯兰教(活跃的但非理性的)和印度教(不活跃且非理性的)全都阻挡至关重要的结合。“从亚洲非知识阶级的神秘的笃信迷信,不能通向一个理性的有条理的生命控制的道路。”^{〔1〕}但欧洲新教主义已经创造了(偶然的)产生突破的重要心理(以及制度陷阱)。

韦伯之坚持欧洲特殊性必须根据鲜明的社会文化来解释,在20世纪20年代及以后,他的著作一经广为流传(及翻译),就激发了大量的著述。它对那些拒绝粗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有特别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认为欧洲的财富和成功有赖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抢劫和掠夺。它鼓励探索那些至关重要的使欧洲平衡木倒向生产投资和持续的技术变迁的要素。它似乎证实这个信念(比韦伯古老得多),即欧洲社会有独一无二的活力,无论多么宏大的其他伟大文化都缺乏物质进步的重要因素。确实,在这个中心议题上,在韦伯的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拥护者们想当然的观点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异。不论好歹,糟糕的动机或没有动机,欧洲激活了一个静止不动的世界。 011

非常容易明白,为什么近几年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现代史受到了攻击。1945年后欧洲殖民帝国的迅速崩溃创造了大量新民族国家。每一个都需要置自身的进步于历史中心的历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英雄,他们面对欧洲文化自负进行他们的民族斗争。新的“民族主义”历史把欧洲的统治(或影响)描述成不公正和压抑的。远非把进步带到世界上停滞不前的地区,欧洲的干涉阻挡了已经在进行中的社会文化进步。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次”历史挖掘出许多前殖民地社会的结构,它揭示了强烈抵抗外来者控制的复杂的农民社区,他们的生活被笨拙的若非残酷的施加殖民“秩序”的企图所

〔1〕 M.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1922; 英文版, London, 1965), p. 270。韦伯也强调了种姓制度的影响和佛教知识界对革新的敌意。参见 H. H. Girth and C. Wright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pbk edn, London, 1974), 第16、17章。

中断。^{〔1〕}“非殖民化史”鼓励了许多不同的社会、种族、宗教或文化团体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在老的殖民记述中欧洲人卓然而立,反对当地黑暗势力,现在看起来像卡通片:关于乱糟糟现实的许多粗糙的未完成草图殖民地人民——教师、作家、商人、农民、移民和少数民族——的雄心壮志和计划也被描写和记录下来。欧洲人在其中冒充是唯一“有活力的”势力的“静止的世界”,现在被看做生机勃勃的世界。而且,远非施加自信的统治,欧洲人(在这种新视野中)常常为忙于自己事务的当地人所算计、利用,或只是漠视。

这并不是历史学家的第一次争论,甚至殖民化的人民也有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自治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年轻的荷兰历史学家 J. C. 范里乐(J. C. van Leur, 1908—1942)谴责了透过欧洲人(“从船的甲板上,堡垒的土墙、贸易据点的高高的回廊”向外的)眼光的印度尼西亚历史著作,好像没有一个欧洲人的存在或他的煽动,那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2〕}范里乐在战争中被杀,他的思想只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传播到广大的国际读者中。但他的著作对欧洲中心论世界史的历史攻击加上了一个关键的新尺度。它放弃了 16 世纪欧洲从海上抵达改变了亚洲商业经济的思想。相反,亚洲是巨大的海洋商业活动的先驱,连接了中国、日本、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和东非,欧洲人是后来者。远非等待欧洲的商人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an)的触摸,一个“全球”经济早已存在了。^{〔3〕}如果全球经济的会合是世界现代史的支配议题,那么亚洲人起的作用(及其他非欧洲人)不容忽视。确实,“全球化”——在其更广泛的意义上——不能再被看做只是欧洲人的方案。

在范里乐最后的 20 年里,他的原创的真知灼见更是大大拓展了。全球流动的规模、大迁移的增长、边疆者的透气本质、大多数国家的有限力量、工业力量的新分布(尤其在亚洲),剧烈地改变了我们的历史感和我们想知道的东

〔1〕 对“次”历史的杰出研究,参见 V. Chaturvedi (ed.), *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 (London, 2000), 导言。

〔2〕 J. C. van Leur, *Indonesian Trade and Society: Essays in Asi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 Hague, 1955), p. 261。

〔3〕 对范里乐的评论,参见 J. Vogel, ‘A Short Life in History’, in L. Blussé and F. Haaststra (ed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s a Category in Asian History: van Leur in Retrospect* (Aldershot, 1998)。